

李辛儒著

民俗美术

与 儒学文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96468

2

民俗美術与儒学文化

常松峰題



200249702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九二·八

(京)新登字第 184 号

责任编辑: 吉 甫

封面设计: 李辛儒

民俗美术与儒学文化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7.5印张插图48页127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1 - 4000册

ISBN7-81001-249-5/G·82定价:9.80元

题 辞

《民俗美术与儒学文化》是一本有特色
的书。作者对于民俗美术深有研究，搜
集了这方面丰富的资料，进而从其中探
求与儒学文化的关系，成为文化学研
究中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同时也为
探讨我们陕西有地域文化提供了战
争。

张定之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于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
研究所

目 录

余树声序	(1)
斯维至序	(3)
修 军序	(9)
引 言	(11)
第一章 生殖崇拜文化的子遗	(14)
第一节 蛙——隐显不灭的文化因子	(15)
1. 史前文物中的蛙	(15)
2. 古文字中的蛙	(16)
3. 民间传说和歌谣中的蛙	(17)
4. 民俗美术中的蛙群	(19)
第二节 蛙与女娲氏之联想	(21)
1. 神话信息辨析	(21)
2. 女娲氏作笙与造人	(24)
第三节 “五毒”——具象符号的奥妙组合	(26)
1. 祈嗣活动的吉祥物	(26)
2. 端午节礼品	(29)
3. 新娘花轿的护轿符	(32)
4. “五毒”非毒	(32)
5. “五毒”内涵揭解	(33)

第四节 蛙文化功能刍议	(37)
1. 表生殖——蛙文化的主导性功能	(37)
2. 驱禳——蛙文化的外衍性功能	(41)
第二章 儒学生殖思想与民俗美术的发展	(43)
第一节 何谓儒学生殖思想	(43)
1. 匹偶关系神圣论	(43)
2. 生生论	(48)
3. 儒学生殖思想与生殖崇拜文化	(51)
第二节 《诗经》中的形象昭示	(52)
1. 所谓“淫奔者之辞”	(53)
2. 希望的珠玑——女人命运的救星	(58)
第三节 民俗美术两大主题的演示	(62)
1. 性爱第一谐奏曲——鱼儿戏莲	(62)
2. 性爱第二谐奏曲——鹭鸶探莲及其它	(71)
3. 性爱第三谐奏曲——狮子滚绣球及其它	(77)
4. 生生交响乐——莲生贵子及其它	(83)
第四节 儒学生殖思想是文化因子聚合的诱因	(86)
第五节 两大主题传习的高潮	(89)
1. 婚姻六礼的需要	(89)
2. 祈嗣贺生的需要	(96)
第六节 几个始生符号的诠释	(100)
1. 《洛书》主变的再抽象	(101)
2. 图案化了的“地祇”	(106)

第三章 儒学伦理思想与民俗美术的 道德宣教	(110)
第一节 儒学伦理思想简述	(110)
1. 纵横四海的孝治思想	(111)
2. 孝治思想与生殖崇拜	(114)
3. 孝治思想推行的社会机制	(117)
4. 孝道与忠君	(119)
5. 人的全面修身标准	(121)
第二节 文以载道的民俗美术	(123)
1. 阵容庞大的祝寿图	(124)
2. 历久不衰的“二十四孝”图	(127)
3. 楷模成群的全德教化图	(134)
4. 劝学与作官	(137)
第四章 《诗篇》文化的垂直沉淀	(144)
第一节 陕西民间灯取罐艺术发疑	(145)
第二节 艺术品中少见的历史大跨度	(148)
第三节 一组无声的婚姻祝颂词	(157)
第五章 余论	(162)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艺术	(162)
1. 价值观的肯定	(162)
2. 非神道	(164)
3. 非禁欲	(166)
4. 非蒙昧	(167)
第二节 精华与糟粕之我见	(172)

1. 道德钩沉	(172)
2. 重铸人格	(174)
3. 人口与妇女问题	(175)
4. 移风易俗, 任重道远	(178)
后记	(181)
图版	(183)

序

余树声

说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想到的自然便是儒家文化。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未尝不可说亦就是儒家文化。

但问题是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了些，往往只把儒家文化局限于儒家的经籍上面。实际上，儒家文化并不是单纯地只表现在儒家的经籍上面，也并非仅仅是仅仅只表现在文人学士或由文人学士上升为显宦僚属阶层的行为方式上。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升华成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根本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向我国民俗的渗透。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向我国民俗的渗透，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同民俗所发生的融合，那么可以断言：儒家文化是不可能转化为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由此，便可以进一步地认为，儒家思想是我国民俗存在的灵魂；而我国的民俗则又是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物质外壳。因此，要研究儒家对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便不能不去重视民俗和民俗学的研究；要研究我国民俗和民俗学，就不能忽略了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研究。

值得高兴的是，李辛儒同志经过多年辛勤劳动而完成的这部书稿《民俗艺术与儒学文化》即将付梓了。它的主

要意义和价值，我以为正在于它将儒学和民俗学联系了起来，将儒学文化和传统民俗文化联系了起来，也可以说它在儒家文化传统与我国民俗传统的发展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而我国的民俗艺术又可视为民俗文化 with 儒学文化联结的一道桥梁。因此，对民俗的研究既可深化对民俗文化传统的研究，又可深化对儒学传统的研究。而本书为我们提供的便是使儒学和民俗之间联系起来的契机。我以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李辛儒先生对儒学的宏观把握和对民俗艺术形态的具体分析之间所做的有机融合，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融合，这就决定于作者对儒学与民俗艺术两个学术领域的精湛修养以及他所具有的创造性研究精神。

看了这部著作，我们可获得这样的印象，即：儒学思想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便体现在民俗艺术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上；民俗艺术所具有的生命力，实质上亦即儒学思想仍然具有的生命力的表现。然而同样为我们所不应忽视的是，儒学思想的糟粕亦与民俗艺术所内含的糟粕是相互渗透着的。因此，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对待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即：一方面正确地对待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能正确地对待民俗艺术。

我很乐意为李辛儒同志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作序，并真诚的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俗艺术感兴趣的朋友，也能有机会看看这部书，我相信是一定会对这部书感兴趣的。

序

斯维至

人是怎样产生的？人类产生了自己，与动物又有何不同？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繁衍后代？为什么要组成家庭和社会？这一连串问题，不但是历史社会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而且是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恩格斯说：“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其第二种生产，即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说到底，就是生殖崇拜。由于上古人虽然明知由男女同房而产生人类自身，种族繁衍所赖以生存和发展，家庭、社会、国家所赖以建立，但是原始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如此神秘而伟大的作用，反而认为只有图腾（动植物和无生物）才能产生人类，更进一步他（她）们认为比图腾还崇高的、有无限权力的上帝才能产生人类。《诗·商颂·玄鸟》是春秋时期宋人为祭祀其祖先而作的诗篇，它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燕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第一版序言。

子或者凤凰，天就是上帝，是由它派遣玄鸟降于人间而后生了商的。这商指全体商人，后来便专指商的始祖契了。

这玄鸟的诗里，虽然还保存原始的图腾思想，但已有高居于图腾之上的人格神——上帝或天的存在，那么，起作用的已不是图腾，而是上帝（天）了。这是社会由母系社会演进到父系社会的思想，而非图腾思想。但是我们仍能从诗里的文字中间可以看出原始的图腾思想和图腾崇拜，比如殷商和宋人都崇拜玄鸟，从而崇拜女性祖先简狄。

1975年辽宁凌源发现一区红山文化遗存，时间约在公元前六千年前，该区有一群石冢墓和一所宗庙式的建筑。在这建筑中散乱着许多被压碎的妇女塑像的断臂残肢，其中有一个头像，清楚地可以看出是一妇女，雍容大方的脸庞，朱红的嘴唇，镶以绿松石的大眼睛，显然是上古人们供奉的对象。考古学者把这建筑称作女神庙。我认为不如把它叫做供奉女性祖先的社，或者叫做“高禖”、“闷宫”。红山文化遗址的主人，我认为可能就是蒲姑，也即夫余，那么它与殷商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倘果如此，那么这女神就是简狄，即有娥氏的姑娘。

周人的女性祖先是姜嫄，姜羌古本同字，也许就是羌人中的分支，姜姬自古有通婚关系。《大雅·生民》诗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大家知道，她是在野外散步时，看见田里有“巨人”的足印，她把自己的脚放在“巨人”的足印上一步一步走着，结果怀了孕，生了儿子，即周人的祖先后稷。这“巨人”无疑就是上帝，那么，后稷就是上

帝的儿子了。这一降生故事里没有提到图腾，这是比殷商的降生故事更进步的反映，或者是因诗的创作比前者较晚的缘故。

这样的降生故事都反映了生殖崇拜。不但中国古代盛行，世界上各族都有这类大同小异的故事。

儒家是春秋战国之际才逐渐形成的学派，当时就已经是宗法封建社会了，距离原始时代已有数万年。

但是在儒家所传授的著作里，如《诗》、《书》、《易》、《礼》、《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里仍然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保存着许多生殖崇拜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里保存的最多、最丰富。尽管其中已经溶合着不少它当时代的思想意识，我们如果用心挖掘，却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固有的“母题”，及其演变的痕迹。因此，在我们研究中，哪些是“母题”，哪些是演变，必须加以区别，否则就会模糊了历史的真相。如男女自由结合，最初只是为了性爱，不一定为了子嗣，在对偶婚或一夫一妻的家庭出现之后，才有求子嗣的目的。有男系为主的家庭，然后才有子女对父亲“孝”的观念，有了宗法才有伦理道德的要求。

我是搞古代历史社会的研究的，曾经于 1947 年时写过一篇《殷代风之神话》，①1980 年写过一篇《说德》，②

① 见《中国文化研究导刊》，第八卷。

② 见《人文杂志》，1980 年第四期。

1985年我又写了《汤祷雨桑林之社和桑林之舞》^①和《由亚瑟器铭文推论燕商文化》(《先秦史论文集》)两文,其中都牵涉到商周时期的生殖崇拜的问题,其中尤其《说德》篇,我大胆提出“德”的本意是“生”,由“生”孳乳为“姓”、“性”。因为姓、性都是因“生”而得义的。德的本意就是“生”、“姓”、“性”,我引用《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的话为证。他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他又说“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因此德就是姓、性的标志,不同的民族,不但姓不同,而且表示性质的不同。今人口语中常说某人德性如何如何,正是其证。德性是内在的,见不到摸不着的,但是它也可以表现于某个人的行为之中,这样德性也就变为德行,也就包涵道德行为的意义了。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物得以生谓之德”、“德者性也”。(《礼记·乐记》)凡此都可证明德的本义是生,即性和姓。孔子在《论语》中只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只是普通的人性,而不是男女之性,食色之性,但是人性与男女之性、食色之性应有渊源关系。如孟子就是一个著名的人性论者,但他不讳言食色之性为人之大欲。不过男女之性、食色之性是一般低级动物所共有的,而人为万物之灵,应该与动物不同,这就是人具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动物无之。如果人只有男女、食色之性,而无仁、义、礼、智之性,那就与动物差不多

① 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了。仁、义、礼、智就是所谓道德。

战国时期不但儒家（孔、孟、荀）注重性的问题，凡墨家、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无不注重性的问题。如阴阳家以天地、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五德）认为是宇宙的本体，即历史和道德的本体，也就是以性为本体的宇宙论。《易经》这部神秘哲学，说穿了，也是以性为本体宇宙论，它讲的就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生成化育的宇宙论。《道德经》以道为宇宙的本体，因而德已降于次位，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不但如此，《道德经》还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它不但否定了德、礼、义、仁、智，而且认为离道愈远，每况愈下，因此它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返于自然，否则就是失掉了性。法家对性的看法比较特殊，它出于道家，而与道家迥然不同。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天生自私自利，因此他们主张法治，他们认为“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两柄》）即用剑的一边杀戮（刑），另一边庆赏（德），这样人民便就范了。他们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是道德连成一词的起源。他把古代社会分成三个阶段，气力者即生产和战争，这有一定的正确性。

话扯得太远了，赶紧煞住。今年七月里，我在岐山周公庙小住，李辛儒同志来访。他带着他的《民俗美术与儒学思想》的初稿来征询我的意见。他搜集了陕西西部各地的剪纸和衣服的装饰图案，他发现其中一个生殖崇拜的秘

密，从而发现儒学思想中也有这种生殖崇拜的思想。他担心是否会有错误，“离经叛道”。我立刻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不但不认为他是“离经叛道”，而且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回去以后，又作了第二次修改整理，内容更加充实。至于儒学思想中确有生殖崇拜的因素，这一点却是我从来所承认的。我一到周公庙，就已经发现庙后姜嫄殿的后面沿着原边就是一排排的窑洞，据说是从前青年男女幽会“求子”的场所。我已经感到意外的发现了人生的秘密，不料，不久李辛儒同志来访，又在民间手工艺品中证实了这一秘密。我的收获实在太大了。因此，我很高兴为该书的出版问世写了这一篇序。附拙诗《游周公庙》一首：

静静卷阿里，苍苍古柏松。

东方尚未靖，一举奏全功。

多士岂空谈，姜嫄孰为容？

飘然引遐想，野外觅巨踪。

诗写的不好，但是有纪念吧。

1990年12月18日

序

修 军

32年前，即1958年夏日的一个上午，在美协西安分会我的简陋画室里，来了一个卷着裤角，腿上还带有泥巴的瘦高小伙子。他一脸严肃相的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卷木刻习作，要我提意见。我认为刻的满有点门道，就攀谈起来，原来这位当时名叫李信儒的岐山县青年，曾就学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被停止学业，送回农村当社员。而不甘寂寞的他，偏偏又于暇时自学起木刻来，心想通过版画创作，反映农村的新生活，充实自己的艺术素养，以弥补辍学的损失。我很欣赏这种在逆境中不气馁的情操与自信。此后，我们便成为创作方面时常往来的学友。

“文革”中我下放到外县，耳闻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些风风雨雨的不幸际遇，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与磨练。1979年他调进了县文化馆。虽历受挫折，但手中的刻刀和抓紧一切条件和时间进行学习的意志，始终未减。天道酬勤，他的艺术素养也与年俱增。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这些年来更是突飞猛进。作品曾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版画展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1984年是他创作的高峰年，他的套色木刻